

（二〇一七年四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亡灵祭坛】	在良知的死刑台上——纪念遇罗克罹难47周年	郝建
【史海钩沉】	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	陈徒手
【春秋史笔】	一具政治僵尸的复活	岳南
【拒绝遗忘】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选载之十）	王复兴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亡灵祭坛】

在良知的死刑台上——纪念遇罗克罹难47周年

· 郝建 ·

一

这年冬天北京几乎没有下雪，气温却一直很低。气象学家说这是北京27年来最为寒冷的冬天。3月5日这天，郝建发出微博：“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执行枪决，年仅27岁……”

今天的年轻人会问，谁是遇罗克？

遗忘，对大量历史事实的惊人的遗忘或者人为的遮蔽、切割，这是民族的羞耻，也许会埋藏着悲剧重演的萌芽。于我，那些历史场景和各色人物却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京郊卢沟桥畔

2008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我去看阿根廷对美国的奥运足球赛，带着索尼Z1C的小型摄像机。眼前是欢闹喧腾的人群，梅西在球场上腾越奔跑，身影矫健。而我的思绪却不时将这声鼎沸的场面切换到1970年3月5日。

那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数万人被召集到这里，高呼口号，支持对十九名“反革命分子”严惩：立即执行枪决。网友薛蛮子在微博中说的不准确，那天的公判大会是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但处决现场不是在那里。很费了一些周折后，我终于寻访到当时的刑场，它位于旧的石头卢沟桥南大约500米，永定河西岸的河堤外侧下方。村民们告诉我，这里旧地名叫南沙筒，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里就是北京市执行死刑的场所。1971年新的卢沟桥建成以后，刑场就迁移到河流的北边去了。

接受采访的几个男女村民在少年时都来看过枪毙人的场景。有个女村民说他哥哥有一次还不小心踩到过人的脑浆。

在那个年代，“群众专政”被认为是法律的创新。法国著名的左翼学者福柯在60年代是颇为著名的“毛主义”知识分子。他说：“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宣战为的是夺取政权……任何战争都以胜利为目标，没有人为正义而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很可能对刚刚被它击败那些阶级实行暴力的、专制的、甚至是血腥的专政。在我看来，这是无可非议的。”

在与另一个法国“毛主义”者维克多辩论时，福柯对中国的执法形式十分赞赏，他说：在中国“国家机器并不执法，”其作用仅在于“教育群众，给群众以政治的训练，开阔群众的政治视野，丰富群众的政治经验，以至于群众自己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能杀这个人’或者‘我们必须杀死他’。”（转引自：郭建：《人还活着，他已经死了——一个中国人眼中的福柯》，《万象》2000年9期）

显然，福柯这里的学说与文革时期令无数人胆战心惊的“群众专政”完全异曲同工，遇罗克的死刑判决就是由群众讨论的。1970年1月9日，北京市的“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公判大会之前的通告，在这一份通告上列出了20名“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供群众讨论。“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在这份名单上，遇罗克名列第十。其罪名有：“遇犯思想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1963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这份通告最后还有一句话：“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是的，今天的人们大概都不知道或者遗忘了文革期间一些流行词汇，“一打三反”、“5·16”，有的词写出来青年人也很难读懂，例如：“革干”、“恶攻”。他们不知道，这些词带着多少血迹和人的生命，至今依然是中华民族心理的巨大伤口。

◇ 1966年·北京东四北大街519号

北京东四坐落着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明星电影院，今天那里已经是装修一新，终日门庭若市。几乎紧挨着它的北边，有一个很小的死胡同，往里走几十米的右手是一个如今已经看不出的小院落，小院落的前面和左右都是拥挤的小平房。1942年5月1日出生于南京的遇罗克从7岁时随家人迁居北京到1968年1月5日被捕，遇罗克就生活在这个小院里。

我采访中遇到的大部分老邻居都很愿意谈论他，除了表示悲哀和惋惜，他们对遇罗克做出的最多评价是聪明、好学。一个遇罗克少年时的棋友说他可以同时跟三四个人下盲棋，还总是他赢。邻居们对遇罗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爱看书，上公共厕所时都拿着老厚的大部头书。从遇罗克家人、朋友、同学的回忆和他的日记中我得知他的阅读涉猎广泛。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波斯人信札》、启蒙时期的作家蒙田的著作、《论语释注》、《元曲别裁集》……就是这些书成了他思想火花的初始爆发点，就是这些书与他那敏锐、勤奋的大脑相撞，使他在1966年前后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冷眼旁观，还颇有抵触和反思。遇罗克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心路历程，他是否知道，就是这些思想和文字很快就会被桂冠文人、思想警犬和专政工具的忠实卫士利用，将他的命运强力推入黑暗的绝路？

1966年1月29日：“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1954年尚可公布预决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十足的愚民政策”。

1966年2月15日：“去看《地道战》，以后的电影，一定离不开读毛著的镜头了，越来越滑稽。”

1966年5月2日：“读《波斯人信札》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宗教本身的爱戴，而且热爱宗教，遵守教规，绝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信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

1966年5月3日：“×××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这些日记摘录发表在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很少的日记片段，都是当时《光明日报》的记者、编辑用钢笔从北京市中级法院尘封的档案中一字一字抄录下来的。现在，这些材料短时间内不容易被看到了。即使从这些日记中也可以看出，遇罗克这样一个家庭出身一栏填写着“资本家”几个字的人在文革前就处处碰壁，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好，报考大学时也挑选了比较偏冷的院校，但还是没能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到了文革浪潮兴起，他这样的“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弟即使不说话，也是十分艰难甚至危险的。面对这种荒诞境遇，遇罗克依然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 1967年1月18日·北京1201印刷厂

1966年12月底，中学生牟志京在北京西什库后库的一个电线杆子上看到了一份油印的《出身论》，“拜读之余，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他按照油印稿下面的联络地址找到六十五中，与遇罗克的大弟弟遇罗文相识。经过他们一番奔走，《中学文革报》在北京1201印刷厂付印，于1967年1月18日正式发行。当时这个印刷厂属于部队，位于现在北三环边的花园路，它的库房和旧车间现在成了一个大超市。我每次去买东西，车就停在厂子业务室门口的停车场。

《中学文革报》第一期的主要文章就是那篇由遇罗克撰写的《出身论》，署名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遇罗克在文章中主要批驳的对象就是那幅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据说江青和陈伯达当时也觉得这幅对联不够正确，江青将其修改为“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遇罗克在文章中列数了多年来用家庭出身决定个人命运的种种丑恶现象，斥责了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对所谓“黑五类”子女的公开歧视和残酷迫害。他在文章中发出庄严宣告：“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

紧接着，《中学文革报》又连续印出了5期，刊发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多篇引起极大反响的文章。这些文章受到当时官方支持的《兵团战报》、清华《井冈山》的猛烈攻击，但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极大的共鸣。读者来信已经到了邮递员不能负载的程度，遇罗文他们只好每天用三轮车到北太平庄邮局去拉回那三四千封来信。许多读者在来信中向《中学文革报》编辑、作者们倾诉他们的悲惨遭遇和求得平等待遇的强烈心声。

一个贵阳青年来信述说，自己在闹市区看到热心人手工抄写的《出身论》，那是洋洋一万五千字的文章。他读到一小部分就抑制不住自己，嚎啕大哭起来。

今天阅读这些文章，会看到其中用了许多文革时期的主流话语，比如“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之类。但是如果与遇罗克仅存的日记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出，两者的话语以及思维模式、根本价值观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也许是遇罗克在那个极端恶劣政治环境中要想发出声音所必须采取的唯一话语方式。当然，我们也不必拔高遇罗克，说他对于最高领导人发动文革的目标和走向都洞若观火。但我们在他1966年5月10日的日记中就可以知道，他那时就从对邓拓的批判中看出这个运动的矛头指向远远要高于北京市委。

2008年，美国西雅图的海岸边，牟志京跟我回忆起自己在办报时为了修改文章与遇罗克兄弟俩的争论和对遇罗克的崇敬心情。对于自己，他有一种无端的自责。在得知遇罗克被判死刑时，他哭了。他后悔，总认为如果遇罗克的文章不在《中学文革报》发表从而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也许不会被杀害。这时，成群的海鸥在我们身边翱翔、号叫，抢食着游人抛洒的面包，那年近六旬的牟志京眼中闪动着泪光。

二

◇ 1968年1月5日·北京人民机械厂

早晨，遇罗克像往常一样带着饭盒去厂子里上班。一到厂子里就被警察带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同时，他家也受到搜查，弟弟遇罗文赶紧把哥哥的一篇文章藏在了自己屋里。在那之前遇罗克已经知道自己可能面临的遭遇。

1967年4月17日，戚本禹公开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立刻就引起新的批判狂潮。戚本禹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这个小组被毛泽东委以重任，几乎是当时中国政治机器的中控机房。根据《光明日报》高级记者苏双碧搜集的资料，1967年12月30日公安部门根据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反革命小集团家庭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决定立即拘押。谢富治于1968年1月1日批示“同意”。

当时高调批判《出身论》的戚本禹1968年1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批准逮捕遇罗克的谢富治后来官至公安部长，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政治机器上的螺丝钉在绞杀别人的生命时，总认为自己是不可触及的，不会认识到自己也会受到无端伤害或者时过境迁的惩处。

遇罗克被捕后很快就被带走，他在工厂的好友杨雨树赶过去没有看到他。后来再看到遇罗克已经是他被警察押着到厂里来接受批斗。前年我到他方庄的住处采访杨雨树，他说自己坐在下面，也跟着举手喊了口号。在他堆满油画作品的小屋里，他给我看他的老师和朋友赵文量为遇罗克画的油画肖像。画像只有寥寥几笔，十分传神。

◇ 1970年2月9日·北京半步桥看守所

戴着十几斤重的手铐脚镣，张郎郎和其他几十人被关进北京半步桥监狱。这里是当年关押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并对她执行死刑的所在。他们一进去，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人喊报告：“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问题要细细交代，可是怎么不提审我，那我怎么交代呀？”

张郎郎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因为读书多，好讲故事，时常对江青等人发些牢骚，被定为反动组织的黑后台。因为1968年就曾经和遇罗克被关在一起，张郎郎听出，这是遇罗克！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冷静的辛辣。通过这种方式，遇罗克睿智地让新来的人明白，这里是死刑号，要大家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同时也在向大家传达一种延缓屠刀下落的方法：就说自己有问题“要细细交代”。

张郎郎是干部子弟，出生在延安，在“马背上的摇篮”长大，文革前在经济条件和升学等方面一帆风顺，一直在育才、101、四中这样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而遇罗克是所谓“黑五类”的子弟，在社会上备受歧视。在监狱里，两人互相讲故事，辩论哲学，论诗谈书，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张郎郎回忆“遇罗克不是监狱油子，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更不会对当局谎言的‘感召’之下，见利忘义落井下石。他也不会老弱病残的犯人身上踩两脚，以示自己手狠心黑，借此镇唬他人”（引自《我和遇罗克在狱中》，载《遇罗克遗作与思考》）。由于得天独厚的家庭条件，张郎郎读过萨特的一些著作，他跟遇罗克谈起存在主义哲学时，遇罗克认为那是吃饱饭撑得没事干的人思考的哲学，而马克思主义才是最精辟、最有指导意义的。

一次提讯时，审讯室坐了二十几个人，主审官员说：“遇罗克，你的态度极端恶劣，今天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否则你就自取灭亡了。你好好想想还有什么话说，我们五分钟以后回来。”这是明白的死亡威胁。五分钟以后，主审官员对遇罗克说：“最后还想给家里留什么话，说吧。”遇罗克的回答是：“我想要家里带一支牙膏。”后来遇罗克告诉张郎郎，主审官员当时气得脸都青了。

但是政治绞肉机终于落下了它的屠刀。文革中最重要、最严厉的镇压运动“一打三反”在最高领导层的推动下掀起高潮。1970年3月5日，张郎郎听到隔壁牢房里一个个狱友被拖出去，听到了遇罗克最后的“呃”的一声，那是他的脖子被细绳子勒住的自然反应。

遇罗克对这最后的时刻早有准备，他入狱之前曾经写过一首《赠友人》：“攻读健将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清明未必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张郎郎现在居住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一栋美丽的别墅里，地下室放着几千张密纹黑胶唱片。他一直想着在自己退休以后设法把这些唱片带回大陆捐给某个音乐爱好者俱乐部。在我的请求下，他哼唱起前苏联的一支歌曲《光荣牺牲》，那是一首他和遇罗克两人都会唱的歌，他们在死刑号里过春节时开临终晚会一起唱过。

◇ 1978年11月·《光明日报》宿舍

1978年之后的十年，是改革开放全面启动的时期，是1949年以来首次允许外部思想进入中国大陆的时期，是内部各种思潮抵触、对话的活跃时期，那是一次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颇有狂飙突进意味的解放和复兴。

1978年11月的一个晚上，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冒着寒风走进《光明日报》记者苏双碧的家中。因为她读了苏双碧11月1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评姚文元〈评新编

历史剧海瑞罢官》。苏双碧在此文中提出“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王秋琳说遇罗克在文革中的第一篇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点名批驳了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一文。这是遇罗克罪状中“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依据。第二天，苏双碧向领导汇报后就带着报社的介绍信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下午四点在北京市中级法院找到了积土尘封的遇罗克档案。档案共有24卷，放在一起将近半人高。第二天苏双碧又约请了报社的两位记者一起来看材料，仔细阅读后，他们认为这是一起冤案。便以《光明日报》的名义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要求为遇罗克平反。

1979年11月21日，遇罗克的家人接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再审判判决书。改判如下：“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二、宣告遇罗克无罪。”此后，苏双碧为此事写了长篇报道《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发表在1980年6月的《新时期》第4期上，随后《北京日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遇罗克的事迹感动了改革开放年代的许多百姓和官员，促进了当时中共中央积极推进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 2009年4月5日·京郊宋庄美术馆

又一个清明节，我和北京的徐晓、栗宪庭等知识界人士以及遇罗克的家人、亲友来到北京郊区的宋庄美术馆，举行了一个十分简短的遇罗克半身铜像落成仪式。人们为遇罗克献上几束鲜花，站立在他的铜像前静静地默哀。

铜像的作者郑敏也来到这里，这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的毕业作品是王小波的一个裸体坐像。郑敏创作遇罗克塑像时，我到她借用的工作室跟踪拍摄。他一边拿着雕刻刀在遇罗克的塑像小稿上细细修饰，一边跟我聊起自己老家文革时发生的一些惨剧。他的老家是湖南道县，道县在文革后成为一个著名的县份，就因为这里在文革中发生过集体参与的较大规模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在湖南省零陵地区道县发生了针对“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大规模屠杀事件，波及零陵地区（现称永州市）其他10个县。据统计，道县事件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达4519人，其中4193人被杀，326人被迫自杀。后来解放军6950部队出动才逐渐制止了这次大规模的屠杀。

遇罗克铜像的底座是不锈钢的，上面刻着北岛题献给遇罗克的诗句：“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诗人北岛的这首诗创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

《宣告——给遇罗克烈士》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空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徐友渔写过这样一段评述：“人类历史上，有两种人对同时代人和后来者的精神和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一种是烈士，他们为真理、为理想受尽苦难，视死如归；另一种是思想家，他们目光如炬，洞察实质，是社会的先知先觉。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两任者寥若晨星，他们承受的巨大苦难和发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辉映，使他们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座丰碑。苏格拉底是这样的人，布鲁诺也是这样的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给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带来空前灾难，反人性、反人道的蠢行、丑行和恶行发展到登峰造极，夺取了无数人的青春、前途、家庭和生命。对苦难的以及黑暗的反抗造就了思想家和烈士，遇罗克就是其中一身兼两任的佼佼者。”

遇罗克的铜像静静地竖立在那里，多数时光都是布满尘土，但这座铜像和这个人的文字、言行却时时在发出光芒，烛照着我们的思想。铜像上的那双沉静、深邃的眸子，时时在凝视我们，与我们进行着穿越历史时空的心灵对话，让我们思考自己的生存意义，提醒我们：不管在任何艰难境遇中，做出自我选择都是无可逃避的。

~~~~~

## 【史海钩沉】

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50年前的北京街道改名运动

· 陈徒手 ·

1

从现存的档案来看，1965年北京已经开始显露修改地名的苗头。其中最为瞩目的一件是，曾长期潜藏在国民党军队的中共秘密党员、率部起义将领张克侠时任林业部副部长，他具名向中央建议更改北京市以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三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名称。张克侠与张、佟、赵曾有西北军同僚之谊。中央内务部接信后，召开部办公会议研究，以1951年12月19日政务院“不应以人名做为街道名称”的指示为由，同意张克侠的意见。1965年2月10日内务部发函致国务院周荣鑫秘书长并转呈周总理，指出上海市已将此类街道名称改掉，北京、天津市仍保留未改，拟请总理考虑批示北京市和河北省人民委员会予以更改。

周荣鑫2月22日将此报告批转给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万里阅处，万里25日转给副市长吴晗：“吴晗同志，此意见我同意，请酌定。”吴晗即在28日此公文上批道：“同意更名，请规划局提出意见，报人委决定。”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接报后，与相关部门研究确定，将三条路均恢复原名或委婉改名，“张自忠路”恢复原名“铁狮子胡同”或与“地安门东大街”合并，“佟麟阁路”恢复原名“南沟沿大街”或因紧挨民族文化宫拟改为“民族大街”，“赵登禹路”恢复原名“北沟沿大街”或因南段有政协礼堂拟改为“团结大街”。此份报告还是谨慎地提醒到，“这三条街名是解放前已有的名称，据了解是国民党西北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阵亡的三名军官的名字，改名后是否对统一战线的部分人士有影响，我们考虑不好，报请审查批示。”

报告送上后，市规划局还去信询问市人委主管文教事务的副秘书长李续刚，李答复说：“暂不复，现还没定下来。”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表态说：“先不改。”此事在文革前是不了了之，各单位借故拖延，没有下文。涉及统战问题，高层领导下决心前难免有些含糊。

但是1966年8月文革火热展开之际，新市委和市委机关群众组织马上向中央汇报：“据初步查证，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等人均非抗日英雄。”一夜之间，“张自忠路”改名为“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改为“中华路”，“佟麟阁路”改为“四新路”。直到1972年初整顿街道名称，又借机降低了相应的革命色彩，恢复原本的地理特征，“张自忠路”不用“工农兵东大街”之名，并入“地安门东大街”。主事者又嫌“赵登禹路”之后的“中华路”路小名大，拟改为“白塔寺东街”，而由“佟麟阁路”变身为政治色彩浓郁的“四新路”，这回就直接改为“民族宫南街”。

## 2

1964年起，北京市花费一年多时间，曾经进行过全市范围的街道名称整顿活动。对四个城区的三千五百九十条街巷逐一考评，整合后四城区街道名称留有二千九百九十四条，对带有封建迷信、庸俗及重名的街道更改了约百分之四十，意在清除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的毒害，修改了诸如思王庵、缠脚湾、狗房庙、八王坟等名称，并登报公布，立柱树牌，汇集整理成册。

即使在那样严酷的形势之下，市委对街道名称的变换还是持慎重的态度。李琪在1965年2月30日一次会议上表示：“旧东西适当保留，有好处……忠孝之类的名称我们也用，孝顺父母，忠于人民。丞相胡同可以不改。”他还明确认为：“红旗、跃进、人民、东风、火炬、向阳等空洞的抽象的政治口号、政治名称不要用，革命的节日、革命的事迹也不要用在街巷名称上，用不好倒麻烦。”

李琪等领导的适时表态一时降低了修改地名的热情，但是更换地名的请求还是经常发生。譬如1965年6月市整顿门牌工作组刘生鑫向市道路命名领导小组组长吴晗、副组长李续刚汇报，建议把“石驸马大街”名称改一改，但吴、李以“石驸马大街是纪念三一八学生运动的地方”为理由，不同意更改，也不让提交市人委行政会议讨论。提意见者愤怒地指责说：“我们北京作为现代马列主义的中心、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为什么要给他们这些寄生虫立碑？这难道是政治挂帅的思想表现吗？不是，分明是对抗。”他们建议把石驸马大街改成“三一八大街”或“黎明街”，甚至取邻近的“鲍家街”谐音，更改为“报佳街”。

对于此次整顿地名的效果，成立于1966年6月的新市委评价极低，认为是“敷衍了事”：“前市委修正主义者，慑于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曾于1965年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对城区街巷名称进行了一次换汤不换药的‘整顿’。虽然在广大群众的舆论下也改了一部分名称，但很多并未脱离原来基础，仍将原来的名称体系保留下来。”

对地名的政治挑剔，对吴晗等市领导不作为的不满，已经是北京主事机构内部酝酿已久的一种情绪，到了文革爆发之时已是按捺不住。1966年6月1日市整顿街巷工作组李如琴、张祖恩、程惠兰、常宣琦写信给市人委办公厅，揭发了李琪、吴晗的罪状，信中写道：“千万不要让封建迷信的东西继续阻挡我们人民前进，继续影响下一代，千万不要花了这么多经费，动员那么多人力物力，整顿了街巷名，仍然是为封建反动的残余势力服务。”



1966年6、7月间，新市委执掌大权后，北京市文革运动汹涌奔流，新起的学校红卫兵组织、单位造反组织都不约而同地要求改革不适合时代潮流的已有地名。市人委在1966年9月14日致国务院、市委的请示报告中，回溯了当时的狂热氛围：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首都的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在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风暴中，对北京的街巷名称提出了许多革命倡议和意见，要求把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色彩的街巷名称，改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使首都的街巷名称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面貌。

报告中称，在讨论街道名称的活动中，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认为主城四个区是首都的心脏，应该“红满城”，拟将西城区改为“红旗区”，东城区改为“红日区”，宣武区改为“红卫区”，崇文区改为“红光区”。海淀区大专学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为“文革区”。丰台区是二七大罢工策源地长辛店所在地，改为“二七革命区”，石景山办事处改为“井冈山办事处”。唯独没有改动的是最符合时代精神的“朝阳区”，这是五十年代刚刚起名的东部新建工业区，这也意味着除朝阳区之外的所有城区名称都要面临变动。现在坊间流传，当时要把北京市改为“东方红市”，但从现有开放的档案中尚未发现此议。

涉及城区二十三条主要街道名称的改动，市人委宣称已有了全盘的考虑，报告中不断重申是“经过红卫兵、工农兵和革命群众的广泛讨论”，从城区的方位一一对应了中国革命历史的关键词语。将横贯首都中心的東西长安街、建国门与复兴门内外大街拟统一命名为“东方红大道”，以体现新中国首都的政治地位；东方红大道的东边道路拟定为“长征路”，西边道路因军队大院居多而叫“解放军路”；沿东方红大道的两侧道路，将依中共党史中做出特别贡献的地方来命名，如瑞金、遵义、延安等，报告强调，将以此“构成为一条革命历史的红线”。最为宏大的提法是，要把前门至南苑的道路命名为“共产主义大道”，市人委做了如此高昂的阐述：“显示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色革命接班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沿着共产主义大道奋勇前进。”

报告中附有图示，清晰标明环绕中南海的一些主要街道的拟定名，如鼓楼至景山北墙为“总路线路”，府右街为“韶山路”，西什库大街为“集体化路”，景山东街为“代代红路”，西四至新街口为“红旗路”，东四至雍和宫为“红日路”，珠市口至马连道为“红卫路”，王府井大街为“人民路”等。图例中还留有几条线路空白，表示“尚在征求意见之中”，如“大跃进路”（地安门东大街）、“人民公社路”（地安门西大街）、“必胜路”（西交民巷）、“大庆路”（东环南路）等。

这个送达国务院的报告只是集中关注了中心街区的变动内容，全市更大面积的地名整顿情况并没有得以及时呈报。更为混乱的修改地名的趋势还在延续，狂热之中的领导机构和红卫兵组织对路名修订之事投入极深，市委一再强调“要进一步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做好命名工作”，竭尽全力要“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事件达到高潮时，市人委会于1966年9月23日正式上报国务院，转告红卫兵和来访的革命群众的两条紧急建议，一是请毛主席给“东方红大道”和“共产主义大道”两条新命名的大街题字，要求能在国庆节以前把毛主席题字的路名牌制作安装；二是请国务院迅速批示北京市9月14日报送的“第一批主要街道命名方案”，以便在国庆节前安装一批新命名的路名牌。

从事后来看，毛泽东并未答应题写路名牌，而且国务院也没有彻底同意北京市第一批命名方案的全部内容，像西城、东城、宣武等区名还是照常保留下来。

据1974年11月14日《关于整顿城近郊区街道名称的材料》透露，文革初期红卫兵把北京412条街道胡同改了名，占全市街道、胡同总数的8·6%。对这样的举动，市人委部分领导还是多少有些担心，新市委处理之时也有几分踌躇。

1966年6、7月，在红卫兵的参与下，主事机构一边批判前市委的不作为，一边加快整顿路名工作的进程。李续刚对此颇感忧虑，认为办事过于仓促反而会使工作难于圆满，他于7月2日致信新市委牛连壁、万里：“这项工作很复杂，北京的庵、观、寺、院、旧官署、古人命名的街道很多，划清又更改是一件好事。但是工作量很大，拟出这么多街道的新名颇不易，需要开很多会，征求很多人的意见，还要有个强有力的班子。原来办公室的人（主要是公安局交通处的人）也不完全胜任。我的意见，这件工作时间关系不大，是否：（一）尚未进行的制定路牌的工作先停下来（免得需要再改时造成浪费）；（二）等待运动高潮过去工作一切就绪后，腾出手来再搞。”新市委相关负责人牛连壁同意此意见，他在信上批阅道：“暂时停下来，待以后有力量时再搞。”

但是，修改地名的气势已经无法阻挡，李续刚自己觉得近期拟出成千上百个新地名“颇不易”，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各城区纷纷上报修改材料，争抢热门的红色用语做地名，以致于重复的名称大量出现。市人委1966年12月7日称，截止11月7日止，各区共上报街巷名称一千一百零七个，经过平衡，发现各区相互重复的有四百一十七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市委甚至为此提出，各区要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协商处理。市人委在当年年底致国务院的一份工作报告中也透露，由于有不少街巷地名，群众已经自动命名，重复甚多，目前正在忙于统一平衡。

最受人们推崇的街巷名称应是具备红色、东方、蓬勃、群众等特征的革命性词语，各城区争先恐后地申请标注，根本不考虑历史缘由、地理方位信息及群众习惯，谁先抢注谁就占先。下列这些街道名称都是文革初期政治风云的快速产物，由政府部门先后批准发布，可以涵盖北京全城新地名的种类和特点：“育红路”（景山东街）、“四季红路”（大羊房路）、“宇宙红路”（百万庄大街）、“红光路”（珠市口东大街）、“东红路”（酒仙桥路）、“红电路”（广宁路）、“普红胡同”（西老胡同）、“永革路”（台基厂大街）、“永进路”（黄寺大街）、“霞光街”（东皇城根北街）、“光明路”（夕照寺街）、“向东路”（车公庄大街）、“赞东街”（东马尾帽胡同）、“曙光路”（天坛路）、“志远路”（北洼村路）、“炬辉路”（北蜂窝路）、“智勇路”（晋元庄路）、“秋收起义路”（马家堡路）、“大寨路”（东环北路）等等。

最为省事的办法是以一个革命化的新名称替换一大片胡同名，譬如东城区决定从东单二条到前炒面胡同，按顺序改名为瑞金路头条至三十条；从大甜水井胡同到菜厂胡同、锡拉胡同、东厂胡同，列为人民路一至九条；从交道口南头条开始，相隔分司厅、谢家、车辇店、灵光等胡同，一律改为大跃进路头条至十五条；从南锣鼓巷、福祥胡同、蓑衣胡同到帽儿胡同、黑芝麻胡同，一连串最具老北京风味的胡同名统一变更为辉煌街头条至八条；西银丝胡同到缎库、飞龙桥、灯笼库、文书巷、骑河楼、草垛胡同，这么多充满古意的胡同名依次消失，排序为葵花向阳路头条至二十四条。

东城、崇文等城区主事人员的改名方式颇具代表性，没有顾及任何胡同定名的原则性科学性，更不讲究新旧名称的衔接关系，出手大胆，大都率性随意，把文革的政治常用语基本用尽。如把南下洼子胡同改为“学毛著胡同”，前肖家胡同改为“歌颂党胡同”，豆角胡同

改为“红到底胡同”，安乐堂胡同改为“红浪胡同”，官房大院改为“红思想大院”，豆腐池胡同改为“朝红胡同”，八宝楼胡同改为“灭资胡同”，黄家店胡同改为“兴无胡同”，东羊管胡同改为“防修胡同”，纳福胡同改为“鼓舞胡同”，轿子胡同改为“爱群胡同”，辛寺胡同改为“喜报胡同”，等等。

5

在各区上报的方案中，也有一些靠谐音取名，如魏公村路改为“为公路”，算是当时取名较有巧劲的一例。三里河路紧挨钓鱼台国宾馆，借地名之利取“革命友谊路”，一时为高层叫好。有的则是反其意用之，如藏经馆胡同就逆向改为“反封建胡同”。

1966年9月市人委办公会议逐一审查新地名方案，对“一片红”新地名大致认可，就是稍觉得群众提名的“葵花向阳路”（南池子北池子大街）、“红心向党路”（南长街北长街）名称较长，可简称为“向阳路”、“向党路”。在这份报告的草稿页上，从外地调京的几位新任市委领导逐个划圈同意，刘建勋写道：“提不出意见。”高扬文的批语中含有一些疑虑：“基本同意，有的路太长，将来会带来不方便（寻找住户不便）。”

高扬文所担心的问题实际上困扰好几年，1966、1967年及后来几年在市人委（后为革委会）文件中已多次提及。鉴于文革初期群众自动命名一些街巷，在通信等方面已经开始使用，政府相关部门又不便干涉，造成了既定事实。从那时开始，邮电、交通等部门不断在内部渠道反映存在的实际困难，譬如每天有三四百封信件、电报、汇款单，由于群众使用了未经公布的新街巷名而无法投递。出租汽车司机、客运三轮车工人查找不到顾客所说的新地址，因“满城红”而缺失应有的方位感，破坏了几百年传承下来的地理信息，感到大小胡同“乱极了”，原本熟悉的老地方变得异常陌生。公交电车售票员几年间在报站名时，新旧站名都要同时报出。报社记者在写报道时一涉及地名就发愁，公安机关办理案件也为地名所干扰。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政局趋于纠左和务实，一些激进做法也得以制约和变动。地名使用不便的问题也终于摆在市委的议事日程中，当年年底市委指示对文革初期更名的街道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结果表明当时改名的街道共有四百二十一条，并首次定性为：“这些路名的改变，既未经批准，多数路名也未为群众所接受，比较混乱。”这就变相以市委的名义，委婉、间接地否定了文革初期狂热的改地名活动。

北京市有关部门召集会议进行研究之后，很快向高层提出建议，就是恢复文化革命前原有名称的街道胡同三百七十九条。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很快平静地接受这样“复辟”的现实。大家传诵的新闻是，最热闹的“人民路”恢复为“王府井大街”，“南昌路”恢复为“崇文门外大街”，“代代红路”恢复为“景山东街”等等，而这样大规模清理红色标记的行动并没有声张，市委市人委只是简单行文一张就低调完成。

文革初期改名的街道，市里只考虑保留十六条，理由是“已为群众所接受”。像崇文区“锦绣巷”因挖人防工事而闻名，登报大力宣传，参观人流不断，做为全国先进典型就不再恢复“鞭子巷”原名。被官方誉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曾在石驸马大街的女师大任教，西城区建议保留新起的“新文化街”，倾向于不恢复原名。在各区中，对政治依然葆有热情和警惕的当属朝阳区委，或许介意“西大望路”的政治含义，以“此名没有依据”之由，建议改“光辉路”。区委坚决认为东大桥路的原名不如文革新起的“东光路”，找出的理由是，“因这条路有千户居民，对东光路熟悉了，不想再变更了，还是定为‘东光路’好。”

位于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东扬威路，在文革初期已由周恩来直接确认为“反修路”，几乎是全城首个实地换置的新路名牌。此次原本意见是“恢复原名”，但某位领导在报告原稿上面用铅笔批示“不动”。另一个敏感的地名为“反帝路”，高层考虑到尼克松准备访华，其先遣队已到京，现在若将“反帝路”的牌子拆掉，容易引起外界的误解。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指示：“反帝路的牌子也不要动。”至此，涉及拆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未经批准更改的路名牌子专题，市公安局军管会值班室于1971年底报告，目前除反修路和反帝路的牌子未拆掉外，其余都已拆除。

最奇异的是，原来的路名牌是汉字和拼音并列，而此次却取消拼音。整顿办公室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拼音过去是由文字改革委员会负责搞的，现在这个机构已撤销，人员大多放下了，其它单位搞不了，另外搞拼音制造起来也很麻烦。”

## 6

1972年开始路名整顿，效率低下，门牌安置工作直到1973年底也未见成效。据统计，需要更换门牌约三万多个，北京仅有的两家搪瓷厂无法完成，叫苦连天，迫使市政工程局、房管局给日用搪瓷厂加派三十个工人，计划在1974年3、4月间陆续完成。但市革委会副主任万里仍有犹豫，牌子接近烧制完成之际，他指示：“现在仍不要挂牌，何时挂将来再说。”

万里的预感是有道理的，此时段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又带来了一大批有问题的街名。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听到不少群众的意见，提出对市区明显反映孔孟之道的路名，是否也改一下为好？群众集中点到的有忠恕里、孝顺胡同、贤孝里、育仁胡同、儒福里、里仁街，取名大都出自《论语》中的“里仁篇”，建议按谐音简单改为“众书里”、“晓顺胡同”、“贤效里”、“育人胡同”、“如福里”、“里人街”。再一细查，又发现像居仁里、仁寿路、崇善里、孝友胡同等有孔孟之道之嫌的百余条路名，继而又扩充到像义和胡同、福禄巷、禄长街、禄米仓胡同、双吉胡同、灵境胡同、灵佑胡同、灵光胡同、恭俭胡同、元宝胡同、文昌胡同等带有传统文化涵意的老胡同。

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细致研究后，赶紧附上“文化革命初期扫四旧时未改名，现在批林批孔中感到要研究”的主要街巷名单，共有86条，请示领导是否需要更改。报告中称，在当前批林批孔的形势之下，如按“忠恕里”原路名烧制，烧制工人也会有意见。万里批示道：“我看这些意见很好，请找有关人研究一下，给市委写一报告。目前这些有问题的街名暂停烧制。”但万里又略有踌躇，他添写一句：“有的也可以不改。”

最终市委谨慎再三，确定只更改忠恕里、孝顺胡同、育仁里等九条街巷的名称，更改的幅度少于预料。但是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突然来临，不得不深入查究涵蕴孔孟之意的胡同名称，由此打乱了门牌烧制安装的预定计划，致使新门牌迟迟不能安装，公安、市政、房管、规划四个局人员组成的联合办公室也无法办理交接手续。

值得注意的是，1974年11月14日市整顿办公室上报《关于整顿城近郊区街道名称的材料》，罕见地称文革初期红卫兵小将破四旧立四新的举动为“同时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只是肯定了反修路、反帝路、五四大街等新街名很有意义，承认了当时的举措失当：“因为是自发地搞起来的，带‘红’字的太多，达七十一个容易混淆（如红兵、红小兵、红江、红湖、红塔、红电等），有些名称作为街道名称也不合适（如红到底、红宝书胡同等）。这几年来的实践也未被群众所接受，习惯上还用原有名称（如颐和园、王府井大街等），反而给信件投递、消防急救、群众查找等带来不便。”这无形中就在内部否定了文革

初期的“红遍地”改名浪潮，并悄然形成党内外共识，但极力回避公开表态，没有随意在党内文件、报刊上提及。

据1974年11月18日《全市路名整顿数字》显示，全市519条主要街道胡同名称之中，恢复文革前原名称的有389条，文革初期被红卫兵、群众组织修改名称的仅剩14条。1975年11月14日，市革委会批复朝阳区革委会，同意将“曙光里”改回原名“垡头”，“东红路”改回“酒仙桥”，“大寨路”改回“呼家楼”。这是文革结束前、目前所能查阅到的涉及改名的最后一笔官方记录。

□ 原载《炎黄春秋》

~~~~~

【春秋史笔】

一具政治僵尸的复活

• 岳 南 •

1969年10月10日。夜，漆黑。风，疹人。一股肃杀的气氛缠绕着古城北京某监狱。

行将归天的吴晗，苦苦挣扎着不肯离去。

呼吸越来越困难了。他双手紧紧扼住自己的下颚，笨拙的身子在被他热血浸泡过的干草上急剧地抽搐、颤抖，两条干瘦的小腿伸开、蜷回、又伸开，灵魂在挣脱躯壳的最后时刻是那样不情愿。或许，这颗痛苦的灵魂在彻底绝望之前，还要回到清华园的绿草地、北京市政府那张明净的办公桌前，到定陵那神秘深邃的地宫中再走一趟，向他们一一告别、辞行。

然而，这一切都不属于他了。今天，属于他的，只有悲愤和无尽的悔恨。

◇ 复活的海瑞

公元1587年11月13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他的住所与世长辞。这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对于他的事非功过应该如何评论，人们曾发生过尖锐的争执。这争执一直延续了三百多年。

就在海瑞谢世三百年后的1959年4月，他的死尸复活，并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位海大人的出现，引起的社会震动要比他当年的进谏事件强烈得多。由此发生的整个国家民族的灾难，大概也是这位封建时代的正直官吏所无法预料的。

自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不少干部怕招惹是非，开始对自己的言行细加斟酌了。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更使一些干部缄口无言，对许多问题报喜不报忧。毛泽东察觉了这个问题，并在1959年4月党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上，对这种不敢讲真话的作风提出了批评。一次在看完家乡的湘剧《生死牌》之后，毛泽东向一位分管宣传的领导人讲了海瑞的故事。他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他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以后被关进监狱。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本人还

是忠心耿耿的……”毛泽东指示这位领导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做宣传工作。

涉及到明史，就不能不想到作为专家的吴晗。这位领导把毛泽东的指示给吴晗讲过之后，鼓励他来写有关海瑞的文章。于是，吴晗施展才华很快写成了一篇《海瑞骂皇帝》刊登在同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突出一个“敢”字，之后，吴晗以极大的热情和驾轻就熟的技巧，又写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等文章，其宗旨和主要内容，仍然是着重宣传海瑞敢说话、敢说真话的精神。

翻阅当年的报刊，我们不难发现，吴晗在所写的关于海瑞的一系列文章中，最重要的当是《论海瑞》一篇。此文写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发表于庐山会议之后。文章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海瑞一生的功绩，对海瑞作了充分的肯定。在“海瑞的历史地位”小标题下，作者谈了他研究海瑞的目的和意图：

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我们需要站在人民立场、工人阶级立场的海瑞，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进行百折不挠斗争的海瑞，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的海瑞，深入群众、领导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海瑞。

这样，封建时代的海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显然，吴晗这一系列文章，已远不是清华园时期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了。他要按照“古为今用”的意图去描写历史、再现历史，使腐朽的历史人物又有了新的含义。出于政治和形势的需要，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吴晗甚至画蛇添足地加入了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海瑞的文字。这段文字和全文毫不相干，而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加上去的一段话。其用意及所指已很明显。

1959年9月，北京京剧团演员马连良约吴晗把海瑞的事迹改编成戏。尽管吴晗并不熟悉戏剧，但由于朋友的期望和海瑞精神的鼓舞及形势的需要，他还是答应下来，硬着头皮在京剧界知名人士的帮助下，于1960年3月写成五场京剧《海瑞》的剧本。为慎重起见，吴晗在征求了文化、戏剧界负责人及朋友的意见后，才于1960年底开始彩排并改名为《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和其他剧本不同的是，由一位历史工作者而不是戏剧工作者写成的。这种史学家和戏剧家的协作，理所当然地在文化界、学术界人士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另一方面，《海瑞罢官》在写海瑞同恶势力斗争中，表现出刚直不阿的精神，不但伸张了历史正气，而且对现实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直到今天来看，这个剧本从创作意图到题材都是积极的，体现了党的文艺观点，按说不应有所异议。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将围绕着海瑞这具复活的僵尸开始蠢动。

◇ 吹皱一池清水

此时的吴晗心如刀绞，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一番心血竟会成为令人痛心的众矢之的。

1965年11月11日，吴晗从外地开会回来，和往常一样来到寓所西屋的书桌旁，翻阅当天的报纸和有关历史资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放在他书桌上那堆当天的报纸里，会有一篇文章竟是要把他置于死地的信号。

吴晗刚坐下，妻子袁震就从正房走过来。她脸色惨白，指着桌上那张头一天的《文汇报》，怔怔地站了一会儿，没说一句话就悄声走开了。吴晗顺手打开报纸，原来刊登着一篇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他粗粗地看了一遍，觉得过于牵强附会，所用史料也有不少是断章取义，大有蛮不讲理的势头。本想不去理会，但出于一种政治的敏感，他又不得不认真地看了一遍。

当他读到文章最后一部分时，不禁大吃一惊。“《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吴晗读了这段话后，愤慨之余，静下心来细细琢磨一番，觉得这不是一篇学术讨论的文章，也不太相信这篇文章仅仅出自姚文元一人之手。他隐约地感到，一场风暴就要到来了。

10天之后，当吴晗得知姚文元的文章已在上海出了单行本时，心情越发沉重起来。一篇学术讨论的文章竟然发行单行本，这意味着什么？可是，吴晗不会想到，江青为了炮制姚文元这篇文章，早在1962年就以她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批《海瑞罢官》。1964年下半年，江青又亲自出面，要北京一个作者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遭到拒绝后，又跑到上海找她的老搭档张春桥着手组织人马。1965年初，姚文元奉命把初稿炮制出来，并由张春桥亲自修改。江青特别交代，文章“不用叫周恩来看”。

迫于当时的形势，11月底，北京各报不得不相继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北京日报》于11月29日被迫转载此文时，在按语中特别强调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并说：“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第二天，《人民日报》也被迫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按语指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互相争论和互相批评”。《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按语分别由彭真和周恩来定稿，从中不难看出，他们为保护吴晗的良苦用心。

1966年3月，由北京市委书记万里出面，让吴晗下乡去参加农村“四清”工作。显然，市委领导是想保护吴晗，让他换一个环境。当吴晗来到北京郊区昌平区大东流村时，对“三家村”的声讨已经遍及全国。吴晗下乡时化名李明光，群众并不知道他就是来批斗的吴晗。

村里开会批判吴晗、“三家村”时都请他去参加，整天广播喇叭都在喊“打倒吴晗”。有一天公社批斗一个流氓小偷，揭发批判时，有人居然说这个流氓小偷是受吴晗的影响和腐蚀的。此时的吴晗心如刀绞，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一番心血竟会成为令人痛心的众矢之的。

自5月8日开始，京沪两地各大报刊纷纷发表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文章，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八天之后的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斗争目标从吴晗扩展到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和文艺、理论、教育、新闻、出版等各界的知识分子。此时，吴晗已被称作“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逐步失去人身自由，被揪到各处批斗，经受更加残酷的迫害。

◇ 走向人生终点

吴晗以真挚的热忱，按照当政者的意图，让海瑞这具政治僵尸再度复活，结果反使自己和两位亲人相继丧命。

1966年5月，吴晗被正式揪出来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刀祭旗了。他几乎每天都要接受揪斗，饱尝难以忍受的痛苦与屈辱。当时八岁的儿子吴彰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把爸爸跪绑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来的法子侮辱他。爸爸三天两头被拉去游斗，学校要斗，区里要斗，县里要斗，这里要斗，那里也要斗。”

在批斗之初，吴晗全家住在北长街原来的住处，但后来被扫地出门。红卫兵勒令他和妻子袁震每天到北长街扫街道，并且随时把他们夫妇揪出来侮辱。酷暑烈日下，吴晗被拖到马路上，跪在粗硬的瓦砾上，遭受残酷的毒打。每次爬起来之后，都是膝盖皮肤划破，鲜血染红双腿和土地。而这时的吴晗，一拐一瘸地回到住处，擦去身上的血迹，便拿起毛泽东签名送他的著作来看。

1968年3月，吴晗正式被捕入狱。

就在吴晗入狱的第二个月，他的妻子袁震也被送入“劳改队”，实行“群众专政”。

吴晗和妻子袁震几十年同甘共苦，很为熟知他们的人所称道。袁震长期身患重病，不能生育。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家庭生活比较安定，袁震的身体也慢慢地好了起来。这时，夫妻俩都想有个孩子。他们的心事被康克清知道后，建议他们从孤儿院领个孩子抚养。吴晗接受了康的建议，从孤儿院借来几张孩子的照片，并看中了小彦。这个小姑娘长得很机灵，很讨人喜欢。吴晗亲自到孤儿院把她抱回来。不久，又从孤儿院抱回一个男孩，取名吴彰。从此他们的家庭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欢乐。

在全国一片声讨“三家村”的喧嚣声中，这个温暖的家庭被破坏了。吴彰在《幸存者的回忆》中写道：“深夜里的猛烈砸门声常常把人吓醒，我缩在妈妈怀里。他们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整个院子里贴满了‘该死’‘砸烂’的大标语。外国友人送给爸爸的礼品当做‘四旧’被砸烂了，电视机也不能幸免。就连爸爸珍藏的姐姐从三岁起画的图画，都在斥骂声里付之一炬……”

进入1969年，一件件更加悲惨的事向这个家庭不断袭来。3月17日，袁震被允许从劳改队回家看病。当晚，住同院的万里听说袁震回家的消息，特地送来了一碗红豆稀粥。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她“最后的晚餐”。备受折磨，身体已垮的袁震，当天夜里突然病情加重，大口喘气，全身抽搐。小彦和吴彰立即把母亲送到北京某医院，但由于她是吴晗的家属，同时又是右派，医院把她视作敌人，没有进行抢救，翌日凌晨，一生苦难的袁震撒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与世长辞了。直到小彦去太平间为她更衣时，袁震的双眼还半睁半闭，面颊上残留着几滴清泪。

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来叫小彦和吴彰去看他们的爸爸。姐弟俩异常兴奋。他们将近一年未见爸爸的面了，以为这次是造反派大发善心，让他们探监。但当他们出门时，来接的汽车竟是医院的牌子。姐弟俩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果然，来人对他们冷冷地说：“你爸爸今天早晨死了。”

吴晗的尸体已被带走，只有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留在了姐弟俩手中。从此，姐弟俩相依为命，苦度人生。1975年，小彦被捕入狱。被抓走那天，刚动过阑尾炎手术，身上还有医生当日开具的证明。她脚带镣铐，阑尾疼痛就给止痛片，哭喊就注射冬眠灵，门牙被打掉了，额头上打开了口子……农历八月十五之夜，小彦在牢房里想起了全家一起度过的最后那个中秋节，此时彼时，此地彼地，死者生者，百种滋味交杂缠绕，她毅然用死向当权者们提出了抗议，但未能如愿。她刚被抢救过来，就又被送回了牢房。

1976年9月23日，在黎明之前的黑暗中，22岁的小彦死在狱中。此时，距江青集团垮台和文革结束只有两周时间。

吴晗以真挚的热忱，按照当政者的意图，让海瑞这具政治僵尸再度复活，结果反使自己和两位亲人相继丧命。富有戏剧性的是，海瑞和吴晗，尽管相隔三个多世纪，但无论人生遭遇、政治主张、道德观念，还是个人生活，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只是吴晗似乎远不如海瑞幸运，至少那位“海青天”的结局，是得到了嘉靖皇帝的宽恕。

□ 原载《中国经营报》

~~~~~

# 【拒绝遗忘】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选载之十）

• 王复兴 •

（上接zk1703d）

## 第七章 在教育革命中度过1969年

### 1、驻新华印刷厂的文科教育革命分队

从1969年4月底至1970年2月，我被历史系8341领导派去参加北大第一支文科教育革命分队，进驻北京新华印刷厂。新华印刷厂是六厂二校之一，也是由8341军管。北大第一支教育革命分队是综合性的文科教革分队，由四个文科系组成，有中文、历史、哲学、国际政治。我们这支教革分队共有十几个人，领队是两个解放军，一个来自空军，一个是63军的；历史系只有我一个学生；哲学系有一个学生；中文系有5个人，有朱德熙教授，两个教师，两个学生（其中一位是程仁双，与我较熟）；国际政治系有一个教师张俊彦、三个学生，其中一个学生叫赵八路（这应是文革中改的新名，好记，到老没忘。）赵八路是8341指定的队长，我和他关系不错。教革分队住在一个平房里的一大间房，所有男生十几人睡一木板搭的大通铺，我的床铺紧挨着朱德熙教授。我们到厂里，每日半天劳动，半天教改。我们全体在轮转车间劳动，这个车间最重要的生产任务是印刷每期的《红旗》杂志。北大一共派出10支教育革命分队，分赴工厂、农村搞教改试点。当时在新华厂，同时还有一支清华的教育革命分队。

我记得当年曾搞过一项教改实验，朱德熙教授到轮转车间给工人学员讲授汉语语法。我旁听了讲课。我觉得做为普及性教育，朱教授讲得很好，深入浅出，列举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语法问题，很通俗化。课后请工人学员提意见，有个戴眼镜的中年工人师付发言说，朱老师讲课，喜欢把眼镜，拿下，戴上，再拿下，再戴上，这么反复弄。这是摆教授的派头和架子，应改正。我听了哭笑不得。

教改中，中文系的程仁双结合工厂的劳动、生活，写过一个话剧剧本，曾受到新华厂 8341 军代表赞扬。

当时在新华印刷厂，经常看到、碰上来新华厂劳动锻炼的中央首长及省、市委一级的领导。陈云、叶剑英一周来二、三次，一次半天，干些坐在桌前折叠纸张之类的轻活儿。叶剑英曾分别找北大、清华的教育革命分队座谈。与叶帅座谈时，他问谁有前几届到工厂、农村的大学毕业生的私人来信，能不能给他看看。我当时想，叶帅可能对把大专毕业生分到工厂、农村有想法，想了解第一手信息。可惜我当时手上没有这些信件能给他参考。

有一次在我们劳动的轮转车间，开批判大会，批判刘少奇、陈云的修正主义经济路线，批判物质刺激、利润挂帅。陈云坐在会场最后一排，戴着老花眼镜，拿个笔记本，很认真地记录。工人发言，我们旁听。工人念稿发言，内容基本上是报纸上的那些套话，加上一些工人的义愤言词。在新华厂参加劳动锻炼的还有几个靠边站的原省、市委书记。与中央首长不同，他们住在厂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最高检副检察长黄火星等二、三个人经常扎堆儿，天冷时常在厂区某个角落一块晒太阳、聊天。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华东局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总是单独一个人，每天下车间劳动，给我的印象，人很老实。

在新华厂搞教育革命，搞的最大一个活动，也是我记忆中最深的一件事是，5、6 月时在厂里举办了一个大型展览，展题是：揭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侵华野心。展览馆的资料、展板、地图、图片、漫画、文字、布置、解说，全部由教革分队的师生收集、整理、制作、操作。教革分队所有学生担任解说员，我也是解说员之一。展览布置好以后，厂里各个车间，以班、组为单位，轮流在上班时间来参观。工人们反映很热烈。

举办此展览的背景是，1969 年 3 月在中苏边境爆发了武装冲突。地点在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东段界河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当时《人民日报》称之为“珍宝岛保卫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我们这个展览，关于中苏边境纠纷的历史问题，与《人民日报》保持完全一致。展览会的基调是：十九世鸦片战争后，沙俄占领了大片中国北方领土，在十九世纪 50 至 80 年代，于中俄边境的东段和西段，沙俄通过中俄不平等条约《璦琿条约》、《北京条约》、《堪分西北界约记》、《伊犁条约》，将 150 多万平方公里中国土地并入俄国版图。通俗地说，在 100 多年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原属于中国领土的海参威、伯力、勘察加也才成了俄国领土。10 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联政府曾于 1920 年明确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但此后的苏联政府一直不肯兑现 1920 年的政府声明，继续侵占中国的大片领土。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交恶后，苏联边防军不断挑起边境冲突。

中国在远东地区被苏、俄占有的大片领土，在毛、周时代，直至邓、胡、赵主政时代，从未放弃过对这大片领土的声索权。但由于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是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契约，因此 1949 年后中国政府从未采取外交、军事手段强行要求收回失地。中国政府一贯按照国际惯例，认为这类边界问题只能在尊重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有关国家平等协商，公平互惠地解决。一时解决不了，就先挂起来，等待合适时机。例如东海的钓鱼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提出了十二字方针：“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权争议可以先搁置，但“主权在我”绝不放弃。但令人不解的是，在 1999 年 12 月，江泽民为什么未通过人大讨论和授取，通过黑箱作业，便放弃了对远东地区大片领土的声索权？江泽民放弃的领土主权是钓鱼岛的三十七万五千多倍。江泽民与叶利钦于 1999 年 12 月签订了《中俄

边界议定书》，对中俄东部有争议边界，达成最终协议，全线勘定。从此中国便断无收回150万平方公里失地之可能。这么大的事情，条约的签订却没有经过全国人大的辩论、审议和授权，且媒体不准报导，老百姓全然不知，只是少数几个人的黑箱作业。这体现了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国特色。中俄边界条约签订后，俄罗斯媒体曾广泛报导，举国欢庆。而《人民日报》只有不到1000字的报导，对条约内容只字没提。

2001年，江泽民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中俄友好条约》。这个条约进一步确认了1999年的边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权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决定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即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的第（十四）项，国家主席实际上只有发布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无签约权。签约权是属于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职权的第（九）项：“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江泽民越权与外国签订条约是违宪的。以李鹏为委员长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负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对江泽民的违宪行为却不闻不问，这是严重的失职和渎职。江泽民应当履行的公布权却不履行，他与两个俄罗斯总统签署的条约，至今没有向全国人民公布。《人民日报》至今没有公布过上述中俄条约的内容。更有甚者，江泽民与俄罗斯还有秘密协定，2001年底经俄方公布，才为国人所知。2001年普京访华回国后，授意俄通社于12月18日以“军事评论员”的名义，公布了1991年江泽民与叶利钦签署的《两国政府间在彼此削减边界地区武装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问题上的相互谅解备忘录》。这是一个秘密协定。协定中，中国单方面承担义务，在边界上主动后撤500公里，不设防。俄罗斯的“军事评论员”说：“中国气魄宏大。”得了好处还要揶揄中国的软弱无能。12月25日，中国大陆的千龙新闻网报道了俄通社公布的《两国政府间在彼此削减边界地区武装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问题上的相互谅解备忘录》，多家网站又转载了千龙新闻网的消息。中国人民才得知江泽民所干的事。

回想当年我参加北大文科教育革命分队，举办揭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侵华野心罪行展览，当时这个展览是六厂二校中二个单位联合举办（北大和新华印刷厂），该项活动中央是知道并认可的，这使我绝对无法理解在30年后，江泽民签的那个中俄边界条约及秘密协定。

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中苏边境形势紧张，北京的战备气氛越来越浓。9月1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新华社于11日的新闻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13日，写此新闻稿的新华社记者，在新华印刷厂提出与我们北大文科教育革命分队召开座谈会，只有一个话题，询问我们对11日新华社发布的中苏两国领导人北京机场会谈这一简短消息的感想。我参加了这个座谈会。这位记者要求我们多谈，他不说话，只埋头记录。国际政治系老师张俊彦的发言我记忆较深，记得他说，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搞两手策略，以谈判掩护突然袭击的企图。他并且举例二战中，日军偷袭珍珠港正是和美国高调和谈之时。这位记者似是收集社会动态向上反映。

2、小弟王复强去了北大荒（略）

3、1969年底：战备疏散、血吸虫病

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之后，苏军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形势十分紧张。毛泽东指示，要抓紧备战，准备打仗。1969年10月18日，林彪下达一号号令，全军进入一级战备。一号号令的序号是由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所规定。（与谣传的林彪政变无关）

一号令下达之前，在京的中央领导人已开始疏散各地。当时北京到处都在挖防空洞。10月18日北大成立了战备组和防空组，在校内多处挖防空壕。《参考消息》有外电报导说，勃列日涅夫准备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外科手术清除。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10月20日北大召开战备动员和教育革命动员大会。10月24日，北大师生分赴江西、汉中及北京远郊区。一方面是战备疏散，一方面是下乡搞教育革命。历史系学生徒步急行军，拉练到房山，进入山区，与当地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下乡搞教育革命。我们驻新华厂的教育革命分队则仍驻守原地不动。

1969年7月至1971年8月，北大迟群党委曾分几批把2200多人的教职工迁移到江西南昌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此处是血吸虫病重疫区。在此，北大教职工曾大面积患上血吸虫病，有人为此丧失生命。对此重大事件，许多回忆文章都曾涉及，但鲜有详细记载与评述。

1969年7月10日，北大工军宣队领导派先遣队23人赴江西南昌鲤鱼洲筹建农场。8月13日、27日派出第二批、第三批共约600人赴江西鲤鱼洲进行建厂劳动。（注1）

1969年10月27日，北大全校20个单位1658人（全是教职工，没有学生），分批到江西南昌鲤鱼洲北大实验农场，下乡种地，改造思想。（注2）

鲤鱼洲是血吸虫病重疫区。清华的五七农场也在此处。全国那么大，为什么非选这么个血吸虫病重疫区办农场？许多老师说是为了对他们劳动改造。看来不仅仅是改造，还有惩罚之意。否则农场选在任何一处农村不就行了吗？为什么偏偏选在众所周知的血吸虫病重疫区呢？

据了解内情的人反映：最初江西省推荐的干校地点在九江边上的一所劳改农场里，北大工军宣队负责人看过之后认为，尽管是劳改农场却守着九江，有鱼有虾，不利于知识分子改造。江西省又推荐了一个地方，在赣南的茶陵，也是个劳改农场，半山腰，整天雾气腾腾，交通不便。负责人还是不满意，烟雾缭绕的，知识分子容易胡思乱想。最后，有人推荐了鲤鱼洲，这是鄱阳湖的一个围堰，是血吸虫病高发区，方圆七十里没有村子。”季羨林在《牛棚杂忆》中也谈及此事：“北大绝大多数的教职员，在‘支左’部队的率领下，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改造。此地天气炎热，血吸虫遍地皆是。这个部队的一个头子说，这叫做‘热处理’，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迫害。”（注3）

早在五十年代，因血吸虫危害巨大，严重影响南方人民的生产生活，使得“血防”成为国策的重要部分。江西鄱阳湖区是远近皆知的血吸虫病重疫区，人烟稀少，人们途经此处都不敢逗留。

北大教师去鲤鱼洲两年之后，1971年6月10日北大江西分校革委会才迟迟有份上呈北大校领导的文件《关于血吸虫病防治情况的报告》，文件说：“分校地处疫区，尽管……积极防治，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血吸虫病。”“从5月21日到6月6日17天内，对分校10个连队358人进行检查（按：是抽查），查出病人（患上血吸虫病）150

人，占已查人数41.9%。加上5月20日出出的33人，共183人感染了血吸虫病。病人中1969年8月至10月来场的（先遣队人员）占91%。（注4）6月12日江西分校党委再给北大党委、革委会发函，说：“分校（所在地鲤鱼洲）四周，都是血吸虫较严重的疫区，到12日已查出病人二百余人。”（注5）6月19日北大、清华两校合办的江西德安化肥厂在所写的《血吸虫普查情况报告》中记载：5月30日至6月15日全厂普查血吸虫病，其中北大129名教职工中有115人感染血吸虫病，占89%。（注6）教职工们反映：在北大农场所在地，苇叶上的露水里都有血吸虫的蚴尾。

血吸虫病的蔓延使得北大分校不少人员出现了腹肿、肝大等症状。农场采取了诸多措施，但效果有限，情况持续恶化。当时，南昌各大医院住满了北大、清华的“五七”战士。于是，办起了农场医院，就地治疗。可是当上级派人前来视察时，领导还隐瞒实情，不让教职工、工农兵学员据实以报。（注7）

从1969年7月北大先遣队去鲤鱼洲，过了两年时间，江西分校才向北京本部的北大党委告急，那时教职工患血吸虫病的疫情已很严重了。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江西分校的8341领导难道对当地血吸虫疫情及其危害一无所知吗？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向北京告急？1971年6月，北大江西分校领导连续向北京总校领导紧急报告血吸虫病的严重疫情，但鲤鱼洲农场并没有立即撤点，直到1971年8月才撤销，搬到北京大兴农场。（注8）北大党委在6月初得到江西的多次紧急报告后，又延迟了两个多月才搬离了地处江西血吸虫重疫区的农场，不知又残害了多少教职工感染血吸虫病。反正王连龙、迟群、谢静宜这些暴发的文革新贵用不着去鲤鱼洲下水稻田干农活，用不着踩着泥水修筑堤坝。北大鲤鱼洲农场撤点时，校党委对撤销理由，在内部只轻描淡写地说，对“当地血吸虫情况原来调查研究不够。”（注9）而领导对外、对教师们所说的撤点理由，只是说当地教学条件太差。

血吸虫病是种可怕的寄生虫病，它们大量存在于江西鄱阳湖区，特别是鲤鱼洲一带的河流、湖泊及水田中，以人、畜身体为寄生体。其尾蚴10秒钟即可经皮肤钻入人体内。幼虫一旦经皮肤、口腔侵入人体便会寄生于人的肠道膜的静脉血管，而后随血液进入人的脏器，特别是肝脏，在肝脏繁殖。一旦肝脏严重损伤，肝细胞不断坏死，便不可逆转，而后会肝硬化、肝肿大，肝坏死，脾、胃、肾、脑功能大受影响，直至死亡。人一旦患上血吸虫病而得不到及时、有效地治疗，潜伏、恶化的时间，有的人会拖很长时间，有些人在七、八年甚至十几年后才会因肝病不治而死亡。北大、清华的8341领导王连龙、迟群、谢静宜既使不懂医学常识，但他们都熟读毛泽东诗词《七律二首·送瘟神》的诗句：“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北大、清华的几位四人帮的喽啰不是把“瘟神”送走、灭绝，而是偏要把中国的知识精英往瘟神那里送！北大因血吸虫病到底死了多少教师？迟群主持的北大党委始终没有彻底调查、统计、公布、问责、道歉、处理、赔偿。尤其是没有追责、道歉、赔偿。

人权的首要内容是人的生存权、是人保护自己生命的权力、是健康生活的权力。迟群之流无视人的生命权、健康生活权，任由血吸虫病残害北大、清华知识精英的健康与生命。这是令人发指的践踏人权事件。

我的第一位北大授业老师也是我毕业后亦师亦友的魏杞文老师（北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教师），1980年8月他以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芝加哥州立大学历史系做研究与进修。行前检查身体发现肝大、脾大。因无其他不良症状，他照常赴美。在美校园他因肝病倒下住院，而后躺在担架上乘飞机回到北京。两个月后于1981年8月5日去世，死于肝病。当时朋友与家人怀疑死因与血吸虫病有关。1982年我在北京见到魏老师的夫人丁始琪老师。丁始琪说，那几年前后有许多北大、清华的中年教师（在鲤鱼洲时的壮劳力），得肝病

去世，传说与血吸虫病有关。当时有朋友劝她对魏杞文的遗体做生理解剖、检验。但丁始琪当时想，人已经走了，做什么也没用了，于是做罢。丁始琪是北大国际政治系教师、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博士的堂妹，魏老师去世后，她于1983年移民去了美国。

丁始琪在美国告诉我：1971年从江西南昌回北京的教职工们，大多数人不知道江西农场曾对部分教职工进行过血吸虫病抽查，且患病率高达40%至80%（不同人群）。回北京后，北大没有对返京人员严格地进行血吸虫病的专项普查。丁说自己从鲤鱼洲回到北京后，就不知道应去做专项医疗检查。更不知道如发现患病应去进行早期治疗，可以治好。她不知道应这样做，领导没有安排。她说，1980年前后教育部统计清华、北大教师的死亡年龄，平均年龄是47岁，极不正常。问题在于：迟群封锁了江西分校于1971年6月对血吸虫病的抽查结果，封锁了撤销江西分校的主要原因是因鲤鱼洲为血吸虫病的重疫区。江西农场的教职工回到北京后，迟群严重渎职、不作为，没有安排返京人员对血吸虫病进行严格的专项普查并通知、安排患者治疗。丁始琪向我证实：她从江西回到北京、北大后，就对防疫措施一无所知，也没去做过检查。这不是草菅人命吗？1980年前后（血吸虫的潜伏寄生期对某些个体可长达8、9年、10几年。），许多北大、清华的中年教师因肝病去世，始终对死因不明不白。

四人帮、迟群、谢静谊草菅人命，任由血吸虫病大面积伤害北大、清华的教师，这是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是反人类罪行！此事件至今没有问责并彻底清算！世人皆知：六厂二校之中的二校北大、清华是毛泽东亲自抓的点。北大、清华的五七干校及其教育革命，毛泽东会不过问、不知情吗？

#### 4、孙蓬一“1·27大字报”

1970年元旦刚过不久，我们驻新华厂北大文科教育革命分队便巡回到房山、平谷等北京远郊区，访问各处北大文科几个系下乡搞战备和教育革命的点，交流教育革命经验。在房山的山里见到班里同学，和徐森、俞政、张文虎、高发元聊了聊，了解到山里很穷，生活很苦，知道他们在搞社会调查。徐森告诉我，当地山区特穷，有的人家几口人只有一条棉裤，冬季白天全家都躲在家里炕上，盖着被，谁出门谁穿这条棉裤。下山后拜访了哲学系的下乡点，见到了宋一秀。

宋一秀拉着我，在一个空旷场地边走边聊，聊了约40分钟。宋告诉我，中央在北京开始全面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声势大，来势猛。宋有点激动，他把听到的中央首长讲话要点（他全记到脑子里了），告诉我。我后来对照材料，记起他告诉我：毛泽东说：

“‘五一六’是最凶恶的敌人。”林彪说：“一定要把五一六分子清查，一个也不能漏网。”周恩来说“五一六是搞反革命活动的。”“中央的权不让夺，他非夺不可。中央的话不听，王、关、戚的话就听。”江青说“五一六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是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王、关、戚。”等等，宋还转述了首长很多话。与宋分手后，我惊讶于他消息之灵通，我在新华厂埋头劳动、教改，这些消息全然不知。当时听他转述中央首长的话，感到中央对清查五一六集团的态度异常严厉，且觉得总理与中央文革之间似乎在竞争此事的话语权和主动权。中央较为新鲜的说法是把王关戚极其紧密追随者定为了五一六分子，这是较新的说法。这一下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面就大了。我又想，宋一秀为什么与我说这么多五一六的问题呢？后来我才明白，他和孙蓬一等人正在酝酿贴一张关于清查五一六的大字报。宋可能是对我打个招呼，予先交待一下他为什么与孙蓬一从对立（在大联合和武斗问题上）又走到一块儿，或许也有鼓动我及我所熟习的学生能与之配合、呼应之意。

回到新华印刷厂后不久，便听说孙蓬一、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韦全贵五人于1970年1月27日在北大校园贴了一张大字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大字报引用了周恩来的指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在整党中，对真正坏人不应放过（比如五一六坏人）。”大字报还引用了江青的话“五一六问题要认真对待，不许他们翻案。”大字报下面这段话，使迟群感到最不舒服，最反感。大字报说“如果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五一六匪帮穷凶极恶的反动本质，那就必然滑到右倾机会主义泥坑，当了‘五一六’的‘防空洞’，起着掩护、包庇五一六的作用。”2月6日，迟群在校革委会讲话，对大字报中说“滑到右倾机会主义泥坑”这句话耿耿于怀，说“大字报的要害就是要翻案，要夺权。”（注10）随后，全校开展了批判孙蓬一的运动。

我们教革分队大约是2月初回到北大，随即解散、回系，准备毕业离校。一回到北大，就看到满校园贴满了批判孙蓬一的大字报，最高的调门是说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的反革命分子”等等。听说哲学系对孙蓬一大会、小会轮番批斗。但孙拒不认错。

今天看来，孙蓬一等人当时有两个问题没想清楚。一是1968年“7·28”毛泽东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后，红卫兵运动已经结束了，造反派已被抛弃，大专院的领导权已被工军宣队完全掌控，其权威不容触犯。毛泽东正在努力恢复、重建中共的一党专政系统。绝不容许政权反对派的存在与生长。二是六厂二校的北大、清华是在8341的领导下，是毛泽东指导全国斗批改的试点。北大的运动部署、重大事件，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正如1969年底1970年初时，北大工军宣队领导小组曾做出的决定：“现在我们学校不搞‘五一六’，外单位搞，我们要大力支持，但我们不参加，我们大搞教育革命，也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教育革命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后期进行社会改造大实验的重点内容之一。北大、清华暂时不开展清查五一六，而专注教育革命，应是毛泽东的意思。以上两点便决定了大字报作者们的命运。他们敢如此尖锐地批评工军宣队领导，势必把他们做为反党的异己分子往死里整。

孙蓬一的大字报说，北大不清查五一六，“其结果必然是黑白不辩，是非不分，敌我颠倒，混淆阶级阵线，长阶级敌人的威风，灭革命派的志气。”这表明孙蓬一对工军宣队处理两派问题不满，对批判他在大联合、武斗问题上的错误不满，因此说工宣队“是非不分”，“灭革命派志气”。孙蓬一原是校文革付主任、文革风云人物，工军宣队进校后，他失去权力，成为师生普通一员，并被批判，上下落差很大，且派性一时无法从头脑中消徐，因而不平则鸣。这是他的心结，确有可批评之处。

但孙蓬一的大字报也有合理之处：迟群、谢静宜到北大后，批判聂、孙、校文革是“派文革、武斗文革”。我记得最先提出这一概念对聂、孙进行批评的正是公社一派的哲学系女生吴丽珍，大约在1968年10月，她在38楼门口东墙贴出大字报，批评本派的派性，大字报标题是：《校文革就是派文革、武斗文革》后来这一提法被工军宣队接过去，并写入上报中央的报告，说北大“校文革是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此话后来亦被毛泽东引用来骂聂元梓和北大校文革。但北大运动中的另一个大问题是，1967年极左思潮曾猖狂泛滥，但在工军宣队进校后却始终未得到认真批评和清理。至使少数师生思想混乱，得不到教育。在我的记忆中，在我于1970年3月毕业之前，工军宣队、8341从未认真批判过北大文革中出现的极左思潮，如无政府主义思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以新文革代替归政府的思潮；反周总理思潮；反军思潮。从未肯定过聂、孙、校文革、原“公社”广大师生反吴传启，反林杰、反王关威的正义行动。1970年4月3日，在北大批孙运动进行了二个月之后，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到北大，讲了公道话，他对北大领导班子讲：“1·27大字报我看了。”“对他们搞吴传启你们还是要承认的。”“他们送了一些材

料，还是比较早的么。”“都否认了他，他总不服气。”（注11）：1970年3月我毕业离校，离校前夕，一天我和物理系好友孟关霖（上面提到的吴丽珍的男友）一起去海淀吃饭。我们毕业分配都被分到了河北保定地区下属县城。看着校园里满世界批孙的大字报，我对孟嘀咕了一句：“这么整人，太过份了！”孟回了一句：“我感到心情压抑，兔死狐悲吧。现在轮到知识分子倒霉了。”

8341进校后，聂元梓、孙蓬一被审查、批判了七年之久。聂、孙固然在大联合和武斗问题上犯有错误，但他们都承认和认识到了。可为什么要这样长时间地揪住不放，并往死里整呢？甚至于1972年10月18日，北大校党委开会认定，聂元梓、孙蓬一是犯了“五一六”罪行的首恶分子，提出不戴帽子，交群众监督，以观后效的处理意见。（注12）更是颠倒黑白，把反五一六的人打成五一六分子。为什么会这样？哲学系教师赵建文（原除隐患战斗队负责人，早在1967年5月就向中央递交材料反映吴传启的问题）告诉我，北大清查五一六，对他审查了很长时间。审查完毕，证明没有任何问题。当时工军宣队的军代表与他有次谈话，军代表告诉赵，整聂元梓是毛主席的意思。2004年时我拜访聂元梓，聂对我讲：迟群到北大后，她一直被审查、挨整，得了脑栓塞的毛病，差点没命。四人邦倒台了才明白，迟群是四人邦的打手，他是奉四人邦的指示来整她的。而四人邦则是听最上面的。她1967年反王关戚，其实是反到了中央文革头上，甚至反到了最高领导头上。

1967年北大群众反吴传启，反林杰，反王关戚，反谢，反极左，是矛头向上，抵制中央文革的极左路线。1970年至1972年中共中央发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矛头向下整群众。毛泽东借此运动，肃清中共政权的潜在反对派，重建、巩固中共执政的权力系统。这时1957年的反右逻辑又重新适用了，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实真正的“五一六兵团”，是1967年夏季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等十几个人成立的一个小红卫兵组织，反周总理，秘密活动。当时中央文革有调查员上报的钢院“五一六兵团”的调查报告。中央文革对“五一六兵团”有多少人一清二楚。然而全国却整肃了300多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许多人自杀、伤残，是一大冤案。

注释（第七章）：

注1、注2：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相关日期条目。

注3：云之扬发布《江西“五七”干校》2009年12月24日凯迪社区史海钩沉。

注4、注5、注6：同注1。

注7：同注3。

注8、注9：同注1

注10：《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相关日期条目。

注11：章铎：《我所了解的孙蓬一》刊于2015年9月15日《记忆》139期。

注12：《北京大学纪事》相关日期条目。

□ 原载王复兴：《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